

# 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效力基础及其实现

王 欣<sup>\*</sup>

〔摘 要〕 宣誓制度在我国古已有之,在吸收国外经验和国内实践成果的基础之上,我国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实属水到渠成。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建立对于宣誓主体乃至整个社会宪法信仰的建立都具有深远的意义。相较于宣誓仪式的程序表现,宪法宣誓制度的效力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内在的心理约束。宪法宣誓的制度设计使得其无论在理论抑或实践中都招致诘难和质疑。我国传统仪式中的政治性和社会性特点,为我国宣誓制度提供了效力来源。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效力需要通过提升国家公权力实施的规范性和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实用性加以实现。

〔关键词〕 宪法宣誓;宣誓制度;政治仪式;效力基础;实用理性

宪法宣誓制度,是指国家元首以及国家公职人员就职时依法公开承诺忠于和遵守国家宪法的制度。我国的宪法宣誓制度在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被正式提出,并于2015年7月1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确立,至此正式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一项十分重要的仪式。在这一阶段中,宪法宣誓制度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针对宪法宣誓制度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其他国家宣誓制度的介绍和分析、对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建构和完善。然而,宣誓制度作为一种具有复杂背景与漫长历史的人类现象,并非照搬或移植他国经验、更不是简单地只要行使了宣誓仪式就能达到效果,需要我们结合本国国情、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and 研究。就目前学术界对于宪法宣誓制度的整体研究状况来看,一是往往将宪法宣誓制度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缺乏对制度内部系统结构和微观要素的分析研究,即没有剖开宣誓制度的“外壳”深入内部,对宣誓制度的构成要素与生效机理缺乏更加具体的分析。二是针对宪法宣誓制度的法律法规制度建构研究较多,缺乏对其法治和社会功能转化问题的研究。针对我国现阶段国情,宪法宣誓制度中的积极因素具有巨大发展空间,能够在诸如提升民族素养、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等更加广泛的社会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功能。三是严重缺乏对我国宪法宣誓制度实施成效的科学系统化评估研究。现有研究中,提升宪法宣誓效果的研究多为倡导型的宏观指引,缺乏对宣誓制度成效评价的系统化指标体系与科学评估方案设计,可以利用跨学科研究方法,通过建立对宣誓制度的内容、成效等各项指标的数理化分析,探索提升宣誓效果的途径。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宪法宣誓制度内在效力基础的研究,着力分析宣

---

<sup>\*</sup>法学博士,安庆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246133。本文是安徽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司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研究:理论模式与实践形态”(AHSKQ2016D07)的阶段成果。

誓制度的外在功能转化,以期更好地提升宣誓制度的整体社会效果。

## 一、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建立

宪法宣誓,是一种以承诺方式来约束和规范自身遵守宪法的行为,它要求国家公职人员在公开就职时宣誓承诺自己忠于宪法并捍卫宪法权威。宪法宣誓制度以宪法为核心构建,宣誓人员在任命就职时须立下遵守宪法、恪忠职守、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庄严誓词。我国建立宪法宣誓制度,最主要原因还是基于我们对依法治国和宪法地位的深刻认识。宪法作为宣誓制度的核心,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授予并限制国家权力,是确认并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础规范,更是宪法宣誓制度的正当性根源。向宪法宣誓,就是向人民宣誓,向国家宣誓。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充分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人民通过宪法将权力授予国家公职人员,后者在就职时通过宣誓的方式凸显出其权力来源于人民,其任职后的每一项公务行为均受到人民的监督和约束。因此,宣誓的过程就相当于公职人员向人民许诺的过程,这一许诺要求公职人员在今后工作中以人民利益为先,切实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

### 1. 宪法宣誓制度的国外经验

按照官方统计数据来看,目前世界范围内拥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为142个,其中规定国家公职人员任命就职时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国家有97个,占到近七成比例<sup>①</sup>。英国《大宪章》作为英国的准宪法性文件,1215年英王约翰通过宣誓方式承诺遵守,成为了世界范围内宪法宣誓的首次实践,而真正将宪法宣誓作为一项制度以宪法方式规定下来,则是1787年美国宪法第2条第1款,其内容规定美国总统在就职前必须公开向宪法宣誓效忠。自此随着这项制度的传播与普及,各国普遍规定了特定公职人员在就任前向宪法宣誓的制度,并展开了广泛实践。不仅如此,即便是在英国这样的不成文宪法国家,也存在类似于宪法宣誓制度的首相就职宣誓,并逐渐成为英国的宪法惯例。

考察各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实践情况,从宣誓人员成分来看,需要在就任时对宪法公开宣誓的主要是如总统、总理、首相、议员、法官等一些居于特殊职位的重要国家公务人员;从宣誓的誓词内容来看,通常是以遵守宪法和法律、效忠祖国和人民、恪忠职守等为主要内容的庄严话语;从宣誓场合来看,大陆法系国家的元首宣誓一般在国会举行,而普通法系国家则大多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宣誓仪式,比如美国。此外,实践中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宣誓仪式均为公开举行,并为了避免宣誓流于形式,大多为宣誓者单独而非集体宣誓,并允许尽可能多的普通民众参观仪式全程。

从国外宣誓制度的历史发展来看,有鉴于西方社会的宗教盛行之背景,国外宣誓制度起初多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并随着宗教国家的建立逐渐过渡为对最高统治者的宣誓效忠。时至今日的宪法宣誓制度,逐渐弱化了宗教的浓厚基础,而更多地表现为以庄严的宣誓仪式唤起就职者的对宪法的忠诚。向宪法宣誓,不再只是表现在宣誓仪式上的简单喊口号,更是对宪法、对国家、对人民的一种承诺。对宣誓就任者而言,宣誓即意味着他不仅要承担宪法所规定的法律义务,更意味着一旦违反这些义务就要受到包括内心谴责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惩处。

### 2. 宪法宣誓制度的国内制度实践

我国古代虽然没有类似于现代的宪法宣誓制度,但有关宣誓的实践在政治领域和民间生活领域却早已有之。据《周礼》记载,我国古代的宣誓分为“誓”与“盟”,“前者依誓礼以结方语之约束,后者,

---

<sup>①</sup>另一统计数据为,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177个国家规定了宪法宣誓制度。见孙谦、韩大元:《世界各国宪法(四卷本)》,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

歃牲血而立神誓；盟约之辞，则载之于策，或藏之官府，以供将来之勘证。”<sup>①</sup>在历朝历代中，宣誓作为一种仪式，在皇帝即位、祭拜天地、泰山封禅等重大政治活动中经常加以使用。纵然朝代更迭，这种隆重的宣誓仪式却始终被保留和传承下来。《周礼》中“有狱讼者，则使之盟诅”的表述也表明宣誓还被作为古代查案时使用的重要手段，赌咒盟誓且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由于古代生产力低下，人类认知能力有限，基于对神明的忠诚和敬畏，人们求助于超自然力以使违反神灵旨意者受到惩戒。以上这些都表明，宣誓制度的最初起源是人类对于超自然神灵的顶礼膜拜。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宣誓制度始于民国初期。孙中山先生曾为宣誓制度正名“今世界文明法治之国，莫不以宣誓为法治之根本手续”，并在其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誓典礼上庄严宣誓以“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图谋民生幸福”为己任，开启了我国现代国家意义上的宣誓制度实践。此后颁布的南京国民政府《宣誓条例》、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都以法律文件的形式对宣誓制度作出了明确的规定。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在入团宣誓、入党宣誓、诉讼过程中律师或证人的宣誓等诸多领域中，宣誓制度业已被广泛使用。香港和澳门于回归祖国之际都分别举行了庄重的宣誓典礼，并以特区《基本法》的形式对宣誓制度加以规定。近年来我国如河南和浙江等部分地区也开展了针对人大代表和法官的就职宣誓实践。

基于以上的种种经验成果与制度实践，宪法宣誓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实属必然。我国宪法宣誓制度于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被正式提出，并在2015年7月1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会议决定规定“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一府两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在正式就职时以统一的70字誓词公开向宪法宣誓。自此，全国绝大多数省份、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制定地方宣誓制度实施办法，开展实施宪法宣誓制度。

## 二、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效力基础与来源

宣誓行为自古代产生并伴随人类社会发展，逐渐形成文化积淀并被固定为一种制度化设计，考察宣誓制度的发展历程，其在内涵、形式和功能各方面均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而宣誓制度自产生伊始，无论在理论抑或实践层面，在被积极肯定的同时也遭受诸多诘难与质疑。

从宣誓制度的理论基础来看，研究者对其普遍提出质疑：建立在宣誓者的内心约束基础之上的宣誓行为，是一种违背理性且随意性极强的制度设计。威廉·葛德文在《政治正义论》中直言指责宣誓行为缺乏必要的道德基础，因而难以实现其内心约束作用。“誓辞明白指出：‘不能只根据你的话就相信你。’当人们在这最庄严的场合习惯地被人蔑视时，却很少有人能够出污泥而不受其染。……这是造成不真诚、搪塞和虚伪的最重要的原因。……它削弱了道德原则的根本基础。”<sup>②</sup>现代社会人们摆脱了迷信与盲从的标签，科学与理性成为了时代崇尚的价值观，在此影响下，人们信守誓言的心理和道德基础已然动摇，越来越少的人相信违背誓言会受到心灵的惩戒。

宣誓制度在具体实践中主要面临两方面的问题，成为其一直以来被诘难的重点。其一，宣誓制度重形式、轻实质。宣誓制度主要针对即将走马上任的就职人员，任职已成既定事实，因此他是否会进行宣誓并不会影响他在既成事实上就任职位。从这层意义上理解，宣誓制度相当于是一种事后行为，只是一个程序意义上的仪式而已，在缺乏整个社会信仰体系支撑的前提下，宣誓制度的价值也将无从实现。其二，宣誓制度缺乏规范化操作。在实践中，宣誓被广泛运用到少年先锋队入队宣誓、入团入

① [日]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黄尊三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1页。

② [英]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第3卷），何慕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84—485页。



党宣誓、诉讼中律师和证人宣誓等诸多领域,且各自有不同的仪式程序。然而宣誓作为一种庄重神圣的仪式,主要针对的是特殊公职人员等特定主体,且有一套法律规定的特殊程序。如果使用过于广泛,难免有滥用宣誓之嫌,以致于违背宣誓制度建立的初衷。

针对我国是否应效仿西方国家建立宣誓制度这一问题,在理论研究中也存在一定分歧,主要争议点在于,宣誓制度的效果须以宣誓者内心的虔诚和道德约束作为依托,相较于西方国家宣誓制度的宗教底蕴,我国则普遍缺乏堪与西方宗教相媲美的强大信仰作为基础,因而即使建立宣誓制度其效果也难以尽如人意。然而,任何一种新兴制度的产生和实施都会伴随诸多问题,并在修正问题的过程中逐步趋于完善。宣誓制度在设计上的不完善性和待检验性并不能否认这一制度所蕴含的巨大社会价值,即使在宗教主义式微之势下,西方国家的宣誓制度依然在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将关注点更多地集中于对宣誓制度的完善而非其废立。在我国建立宪法宣誓制度,能够增强政府公职人员和社会民众对国家、对法律的敬畏与信心,进而弥补我国现阶段信仰体系不足的现实缺失。

作为一种政治性的宣誓仪式,宪法宣誓制度的效力基础——即宪法宣誓何以在我国产生效用,可以从其外在表现和内在机制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就外在表现而言,宪法宣誓制度是借助仪式的程序规定而获得外在效力的。如《决定》中对宪法宣誓的目的、主体、誓词内容、程序等都作了全面的规定,通过这些程序规定,宣誓者在宣誓仪式中获得某种身份,即决定任命或选举产生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而宪法宣誓的外在效力即表现为通过宣誓仪式程序获得身份的效力。誓词内容对履行职责的表述则通过“承诺”的形式传递出宣誓人知晓且承认自己的职权职责,并将为自己的履职行为负责。

相较于宪法宣誓制度的外在表现,宪法宣誓的效力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内在约束。宪法宣誓可以激发宪法所承载的社会价值共识的重现和回归,使参与人从神圣的仪式中经历神圣的体验,唤醒参与人的宪法情感,使社会价值共识回归社会生活,形塑并整合社会秩序。在宣誓仪式庄重而神圣的环境的影响下,能够激发起宣誓参与人某种心理上的变化,这种心理上的应激反应使他将自身外在的规范性约束转化为对其内在的激励性约束,增强其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其对仪式所体现的价值予以认同与遵循。

伯尔曼曾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sup>①</sup>法律虽对人们的行为形成外在约束和调控,却必须依赖内在的约束和认同。从古代宣誓制度的起源及发展来看,随着文艺复兴和工作革命带来的祛魅和智识开启,社会控制方式从偏重内心的道德、宗教约束转向偏重外在的法律约束,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古代宣誓制度走向式微。而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环境下,仅靠道德和良心的约束,人们已经无法预期宣誓制度所能起到的真实作用。现代社会没有法律是万万不行的,但法律也并非万能,法律只有与道德、风俗习惯等其他社会规范配合才能实现社会治理的目的。

作为我国政治体制中一项极为“年轻”的制度,宪法宣誓制度已经具有了较为完备的形式要件。尽管宪法宣誓制度具有了外在表现与内在机制,但这只是应然效力,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将这种应然效力转化为现实,避免宣誓制度流于形式。古老的宣誓仪式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成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宣誓制度如何产生效力,需要我们回到中国传统的宣誓文化中加以挖掘,探寻宣誓制度作为一种“仪式”其根源所在。

仪式是一种由系统化和秩序化的文化符号搭建而成的象征性交流,它能够展现出人类内心观念中的内在逻辑,并由此构建起社会权力体系。仪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其种类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愈见繁多。仪式的行使和延续需要信仰的力量作为支撑,仪式的生效需要以信仰的存在作

---

① [美] 哈罗德·J.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年,第28页。

为基础。所谓信仰,是对某种超乎常人可直接把握的观念或理想的信奉、持守和追求<sup>①</sup>。这种向往和追求则集中体现在中国传统仪式中的政治性和社会性两个方面。

第一,仪式的政治性。在传统中国的政治生活领域中,自皇权体制诞生伊始,以“权力”为轴心的中国社会主宰着社会成员的方方面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方面,人们对于权力的强大充满敬畏与好奇;另一方面,尽管封建社会民权思想的缺失使得社会成员对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不甚了解,但仍未影响其对最高统治者强大权力的依附、崇拜与信仰。可以说,愈是神秘而强大的事物,普通民众愈是对其追崇和信仰,譬如对权力的追逐。在以信仰为基础的仪式中这种趋向显现得尤为突出。

中国古代皇帝的祭天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仪式,祭祀的主体是“天”而非“民”。在所谓的“天”面前,皇帝对天的未知和敬畏,使得皇帝表现出不需要在臣民面前表现出来的谦卑和尊敬。这一态度上的巨大反差,源于在君权神授思想下,皇帝对于“天”所具有的神秘力量的信奉。统治者希冀通过祭天这种神圣庄重的祭祀仪式表达对“天”的敬畏和依附,并建立起自身与“天”之间的权力赋予关系,以此表明作为统治者其自身权力的授予是得到“天”的庇护的,充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诸如祭天等祭祀仪式主要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政治生活,这正是仪式的政治性所在。皇帝举行祭天仪式,除了表达其对上天所拥有的强大力量的追崇外,更主要是希望通过仪式化的祭祀证明自身皇权来源的合法性,为维护自己的政治正统奠定基础。有鉴于此,古代祭祀仪式常被作为兼具重要性与适用价值的统治手段加以使用。李泽厚认为,“实用理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在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春秋伊始,乃至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运动”,再到明朝的八股取士均含有实用理性的痕迹。除祭天外,传统政治生活中的其他仪式典礼亦都有实用功能,都是统治者来达到治国目的而实行的治理手段。在现代社会中,类似的政治性仪式也被统治阶级作为一种常见治理手段而普遍加以使用。可见,政治仪式自古以来一直被统治阶级作为一种治理国家和臣民的工具而存在,因此举行政治仪式主要源于统治者对实用理性的信奉和追求。

第二,仪式的社会性。考察中国民间的诸多仪式,尽管这些仪式都有一套固定的程序,但仪式并非简单的程序,民间仪式背后蕴含的意义体现出社会的价值取向。涂尔干曾基于社会结构视角对仪式进行分析,他认为“社会结构的形成及其维系离不开社会的整合,即社会个体是在一定的信仰和价值观的基础上相互结合,而仪式则为社会和个体提供了这种基本的信仰和价值观”<sup>②</sup>。照此理解,社会基本价值取向的形成动力主要源于社会成员对仪式背后所蕴含的权力之信仰。中国民间传统中的各种仪式,如最常见的婚丧嫁娶,都需要举行一套程序化的复杂仪式。人们之所以举行这样的仪式,是为了实现保护婚姻美满、安抚亡者灵魂的目的,而这也正是仪式的权力之体现。中国民间传统中的各种仪式充分展现出了对实用理性的追求。如前所述,社会成员相信仪式具有某种强力的力量,并希望借助这种力量实现自己的目的。仪式只有对社会成员具备帮其实现或是安慰、或是约束等目的时,才会被举行。

除此之外,基于“礼”在社会传统中的价值和规范作用,仪式作为“礼”的重要表现方式,还肩负着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群体间沟通的功能。关于这一点,梁治平曾作过精准的论述:“从根本上说,中国人事事以道德为依归的泛道德倾向和态度,只能由‘家’在中国古代社会和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得到说明;而礼之所以据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又是因为,它是连接家国于一的唯一价值和规范体系,是中国古代社会家国合一的大一统格局的最好表征。”<sup>③</sup>民间社会人们通过仪式来实现治理,并增进成员

①卓新年:《宗教比较与对话·第三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5页。

②[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3页。

③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间的沟通与联络。不仅中国,西方国家也常运用仪式来维系群体间关系<sup>①</sup>。

### 三、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效力实现

从外在表现看,宣誓制度体现为一种形式、符号或仪式,但通过对仪式背后其内在效力的挖掘可见,宣誓制度并非仅仅是一种符号。自古代起源伊始,宣誓制度无论从形式、内容抑或社会价值上,伴随人类成长发展至今,已逐渐肩负起职业暗示、约束规范和社会凝聚等诸多的功能<sup>②</sup>。要实现宪法宣誓制度的内在效力,需要使宣誓仪式同样具备中国传统仪式的效力基础——政治性和社会性。

1. 政治性——规范国家公权力实施。“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sup>③</sup>。从前文对宪法宣誓制度的效力来源——仪式的政治性体现而言,实现宪法宣誓制度的价值首先在于规范国家公权力的实施,凸显宪法权威。以分配政治权利、规范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主要内容的宪法实施,其权威性主要体现在宪法能对一切组织和个人产生约束力和规范力。结合各国宪法的具体内容和实际运行状况来看,宪法实施主要集中在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和对国家公权力的规范两个领域。我国宪法亦是如此,对国家公权力的授权与限权是我国宪法规范性体现的主要方面之一,因此,实现宪法宣誓制度的效力,必须要加强宪法实施、提高宪法权威,提升宪法对国家公权力实施的规范性。

以宪法规范国家公权力的实施主要集中于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对于公权力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需要立法机关以宪法精神为指导、以宪法规定为准据,严格按照立法程序制定出相关法律来有效规制公权力。另一方面,除通过普通立法方式实施宪法外,还应不断完善我国的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增强宪法权威。按照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即加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其他相关机关对宪法实施的监督。“以价值引导社会生活只是宪法调整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宪法要得到全面实施,就必须建立具有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不但要审查立法行为,而且要审查一切公权力的违宪行为”<sup>④</sup>。国家公职人员在卓有实效的宪法监督机制之下,其公权力行为才能依法行使并得到有效约束,宪法的权力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2. 社会性——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要实现宪法宣誓制度的效力,逐步树立起全社会宪法信仰体系,不仅要保持宪法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维护宪法权威,还需要从实用理性的视角出发,不断提升宪法在公民心目中的实用性。实用性作为法律的天然价值属性,在宪法中也应得到充分的体现。对公民来说,宪法文本中与公民关系最密切的内容就是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条款,因此,宪法实用性的最好体现就是充分发挥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条款的作用,切实调整好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使宪法能够真正有效地保护公民,实现其实用性。

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提升宪法的实用性,首先需要完善宪法中对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条款。不仅要對现有的已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加强保护,还应更加合理和人性化地设置公民基本权利限制条款,彰显宪法对公民的尊重与爱护。此外,现有的宪法实施监督制度也应得到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增强宪法的监督力度,对国家公权力机关日常公务中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应得到遏制、各项法律法规中损害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条款应得到纠正,凸显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价值取向。

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有效保护是宪法“实用性”的主要体现方式,除此之外,要提升宪法的实

① [美]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王鹏、宋丽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78页。

② 周艳红、周义:《论宣誓制度的现代构建》,《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③ 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12-05,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205/c1024-19793282.html>,2017-3-25。

④ 韩大元:《论宪法权威》,《法学》2013年第5期。



用性,还应建立完善的宪法救济机制,及时纠正侵害公民权利的行为,以此拉近高高在上的宪法与普通公民之间的距离。对公民来说,宪法诉讼是最好的救济渠道,但现阶段,我国尚未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宪法在司法领域的间接性适用使得公民在权利受到侵害时,不能够进入宪法诉讼程序获得救济,导致宪法成为“闲法”,极大地降低了宪法的实用性。然而,我国传统的宪法间接适用说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结合现阶段我国的司法实践状况来看,建立一套成熟且适合我国国情的宪法诉讼制度仍然任重道远。

#### 四、结语

我国的宪法宣誓制度,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郑重提出并随后正式建立,无疑对我国建设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这一里程碑事件的确立,不是简单的从形式上借鉴了国外经验、抑或恢复了古代的文化传统。宪法宣誓制度的确立,不仅表明我国从国家层面设计和执行了就职宣誓制度,更是将这一制度提升到了建立与时俱进和中国特色宪法宣誓制度的国家建构高度。现阶段我国正处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转型期,宪法宣誓制度除了发挥自身积极的社会功能外,更应从整体上建立起一种利于国家、社会发展的作用机制。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建立,能够搭建起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之间的桥梁,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更好地凝聚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有生力量,更好地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责任编辑:杨嵘均)

### China's System of Taking Oath to Uphold the Constitution: Its Legal Effect and Implementation

WANG Xin

**Abstract:** The oath-taking system has a long history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absorbing foreign experience and domestic practice, it is time for China to establish its own system of taking oath to uphold the Constitu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ath-taking syste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helping those who take the oath or even the whole society to develop a firm belief in the Constitution. Compared with the ritual effect of taking an oath, the binding effect of the constitutional oath-taking system is more of a psychological restraint, which causes some criticism and skepticism of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the oath-taking system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However, the fact tha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rituals played both political and social functions provides a solid basis for the effect of the constitutional oath-taking system, which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improving the lawfulness of the exercise of public power and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basic rights of the citizens.

**Key words:** taking oath to uphold the Constitution; oath-taking system; political ritual; legal effect; practical rationality